

迷 失 的 文 明

——析莱辛《野草在唱歌》中殖民权力的分布

陈尚坤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莱辛小说《野草在唱歌》为读者提供了殖民时期南部非洲殖民生活的广阔图景。小说运用象征手法,以独特的视角深度剖析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揭示殖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通过分析殖民时期社会经济与法律制度的演变进程,梳理出殖民地时期殖民权力在南部非洲分布的具体状况。欧洲文明迷失在非洲大陆是殖民主义者追逐私利本性驱使下的必然结果,而由此产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制度赋予了殖民者无上的殖民权力的同时,也完全剥夺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公民权利,使非洲大陆与这块大陆的主人承受了无尽而深重的苦难。

关键词:文明迷失;殖民主义;殖民权力;公民权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1)04-0081-05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研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作品的热潮,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现有莱辛作品的研究从女性主义、生态文学、殖民主义、人性和宗教哲学批评等层面多视角、多维度地再现了莱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然而,目前的研究鲜有从殖民统治与民族自治、殖民权力与民权冲突的视角探索莱辛早期作品中所描述的殖民地殖民权力的分布与殖民地人民早期的民权意识。莱辛在其第一部小说《野草在唱歌》(*The Grass Is Singing*)中通过象征的运用,以细腻的文笔描绘英殖民地时期南部非洲殖民权力分布的广阔场景。笔者将根据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份、性格与命运,分别从殖民权力之“化身”、“落寞”、“迷途”、“终结”的角度,剖析《野草在唱歌》中殖民权力的分布状况。

多丽丝·莱辛作为战后作家的杰出代表,成长于英国殖民地,目睹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苦难,

深知殖民主义的罪恶。从殖民地移居英国之后,莱辛亲历战后欧洲文明在本土所释放出的巨大的发展推力。判若云泥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巨大反差使莱辛开始“用怀疑、热情、远见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①从罗德西亚迁居到英国的莱辛从未被自己祖国当时的文化主流和权威所认可。莱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她总是以独特的视角洞察她所生活的社会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殖民地视角审视英国的帝国与种族主义的“宏愿”;以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探知资本主义的根基;以女权主义者的视角批判性别歧视的偏颇^{[1]918-919}。莱辛的早期作品主要刻画殖民地的生活,深刻揭示殖民主义的罪恶,对非洲广袤的大地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省继而实现民族自治充满希冀。因其早期作品的成就,莱辛被《新政治家》称为“反殖民的殖民地人”^{[2]55}。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作品《野草在唱歌》中,多丽丝·莱辛深度剖析英国殖民地殖民权力的分布,揭示殖民主义和种

收稿日期:2011-10-29

作者简介:陈尚坤(1975 -),男,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BWW056)

① 2007年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莱辛的颁奖词:The Academy cited Lessing as “that 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who with skepticism, 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zation to scrutiny.”

族制度的罪恶。莱辛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洞察殖民主义这一欧洲文明的污点。“通过一个文明的失败和不和谐之音,人们可以最清楚地判断出这个文明的弱点。”^{[3]20}

在《野草在唱歌》中,莱辛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如青草、铁皮房、家犬、姓名、灌木、犀牛皮鞭,这些象征的运用给阅读者提供了微妙却不容忽视的线索,有助于理解作品写作的深意。出生于伊朗的莱辛成长于南部非洲。^①由于亲身的经历,莱辛在这块土地上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艰辛。同时,与“到南非避难的犹太裔共产党人赫斯·莱辛相爱结婚,使莱辛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参与了各种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4]500},继而成为坚定的反殖民者。“由于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和莱辛一贯推崇的现实主义传统,她的作品中有深刻的种族主义题材。”^{[4]500}莱辛认为:“小说应该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其生活和社会问题,刻画其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5]214}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中,莱辛开始探索殖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揭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罪恶以及殖民者给非洲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悲剧根源。她这部充满远见、才华横溢的早期作品“宣告了‘白种人文明’和‘白人优越论’的破灭”^{[4]501}。

在《野草在唱歌》中,莱辛运用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象征:“野草”与“犀牛皮鞭”。“野草”是非洲大陆缺乏生气的土地上最具生命张力的生物,象征着非洲民族自省过程中代表着民权的那部分力量;与“野草”相对应,“犀牛皮鞭”则是殖民者殖民权力的图腾,象征殖民统治的权力。这些象征的运用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殖民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

以象征殖民权力的犀牛皮鞭为主线,《野草在唱歌》中代表不同阶层的四个主要人物被串联起来,读者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南非殖民统治时代殖民权力的分布、维护与冲突。

一、斯拉特——殖民权力的化身

斯拉特是在南非这块殖民土地上发迹起来的农场主、商人和奴隶主。他短小精悍、冷酷而无情,在来到南非之前他只是伦敦街头的小市民,一家小商店的店员助理。斯拉特热衷于跟自己的孩子讲述在南非的成功发迹史。他把在农场上辛勤

劳作的工人们看成是“一群除了给别人生产金子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生活的‘会下金蛋的鹅’”^{[6]7}。斯拉特是“用犀牛皮鞭管理农场”的坚决拥护者。“犀牛皮鞭挂在他的前门之上,就犹如粘在墙上的人生信条:如果必要,请不要在意杀戮。”^{[6]7}斯拉特曾经因为发脾气,用犀牛皮鞭残杀了一个黑奴,为此,他仅仅被罚款了30磅。在斯拉特眼中,犀牛皮鞭不仅是实施压迫、有效管理进而挣钱的工具,更是维护自己作为白人尊严的手段和血统高贵的象征。让斯拉特充满力量的犀牛皮鞭却沾满了黑人原住民的鲜血。农场的农业全部是通过雇佣大量极为廉价的黑人劳动力来完成,除了基本的农业耕作,还有简单的手工业制造以及商业交换,完成原始的积累。以斯拉特为代表的农场主和殖民主义者们原始发迹中每一滴财富的积累都是建立在被奴役黑人的血泪之上。

那么在这块最原始的农场耕作的土地上,斯拉特是如何“幸运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呢?善于写实的莱辛成长于南部非洲种族隔离制度中,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制度有助于读者寻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20世纪初叶,英国的殖民地大多实行领主专制。“由于对南罗德西亚金矿储量估计过高而基础设施投资过多,英国南非公司不得不扶持一个白人农村资产阶级,指望通过农村的发展使自己的铁路、金矿,尤其是土地等固定资产增值,这便为南罗白人农村资产阶级的诞生奠定基础。”^{[7]445}“1923年,英国南非公司结束了在南罗的统治,南罗成为英国的自治殖民地。”^{[7]445}南罗德西亚至此开始殖民自治,当地的白人资产阶级是殖民地的殖民权力真正的控制者。在南非新兴的白人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与白人特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当时人口大部分的非洲原住民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地边缘化,白人资产阶级的兴起完全是以牺牲非洲的黑人权利、利益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肇始于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南非开始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制度,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因而不断被推广和强化。“从30年代开始,南罗白人资产阶级利用其所控制的政权机器推行一整套的种族歧视立法。”^{[7]445}其中,1930年的《土地分配法案》

① 本文的南非是广义上的,包括现南非共和国和现津巴布韦等国在内的南部非洲,是小说创作的主要背景地。

更是以赤裸裸的种族区分为标准,将全国面积的一半分配给占当时人口4%的白人。^①

英国殖民者在南非建立的法律体系赤裸裸地排除黑人原住民的公民权利,甚至他们的基本人权,这些法律体系成为维护白人对黑人压迫的帮凶和利器。实质上是比斯拉特手中的犀牛鞭更为残酷的殖民统治工具。“斯拉特”们——南非的白人资产阶级,正是挥舞起法律的“犀牛鞭”来压迫当地的原住居民,维护他们的殖民特权。

那么有了健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保障的“斯拉特”们为什么还需要犀牛鞭给他们压迫黑奴来虚张声势呢?首先,殖民制度已深深扎根于“斯拉特”们的思想中,获得并维持“权力”在他们眼里就是“正义”的实现。其次,从小说创作的背景时代来看,自由、反殖民、反压迫开始成为文明世界的潮流,南非的“斯拉特”们害怕失去在殖民地的白人的优越地位和殖民特权。因此他们需要选择最野蛮、最具震慑力的利器,来镇压敢于反抗的黑人农奴。南非的殖民者们意识到要想扎根于这块广袤的大地,他们不能采取太过“英国”的风格。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温和和文明是不管用的,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只有残酷的镇压和渗透着血泪的成功。

二、迪克——殖民权力的落寞

殖民主义这一欧洲文明的污点,不仅在玷污着这片广袤的大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使无心抑或无力驾驭殖民权力的白人群体深受其害。

小说中的迪克是没落的南非白人的代表,他懦弱的性格成为生命悲剧的源泉。因为“他根本不属于南非大陆,这块土地也不属于他,他的选择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3]28}迪克对象征权力的犀牛鞭没有任何兴趣。迪克接触并拥有犀牛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他眼里皮鞭是斯拉特强加给他的无用之物,犀牛鞭在迪克那里最终成为厨房的一件装饰品,也没能给迪克带去“好运”。因为“懦弱”的迪克根本无从驾驭犀牛鞭所代表的权力。正如莱辛自己指出的那样:“犀牛鞭对于斯拉特们是如此美妙,对于不太自信的人则没那么美好。”^{[6]7}早在迪克开始庄园生活时,斯拉特就告诉迪克,“在买耕犁或农耙之前应该先买一条犀牛鞭。”^{[6]7}放弃了犀牛鞭的迪克也就放弃了权力,更严重的是,迪克对权力的放

弃破坏了白人在南非生活的神圣准则。恰如斯拉特告知迪克那样,“在南非生活的第一法则:不要让你的白人同胞没落,因为一旦如此,黑鬼们就会感觉他们和你一样高贵。”^{[6]210}这当然是当时南非白人世界的法则,一种维护殖民特权,维持“黑与白”两族世界相互隔离、殖民地扭曲失衡的法律制度。

斯拉特希望迪克像自己一样充分利用犀牛鞭去维护白人殖民者的尊严,但“懦弱”的迪克最终却让斯拉特失望了。在“斯拉特”们的眼里,迪克的犀牛鞭就如同懦弱无能的迪克本人一样毫无用处。斯拉特对迪克的“帮扶”并非出于同情,当迪克开始没落,斯拉特就开始谋划如何吞并迪克的庄园,所以迪克对斯拉特的“帮扶”自始至终地存在着本能的反感。殖民者的同情是虚伪的,他们的贪婪才是真实的、无度的。这种纽带关系更多是出于白人保护“白人情结”,以维持白人群体在殖民地中的集体荣耀。这种“白人情结”与其说来自于对同胞的同情,不如说来自于对白人为优等种族殖民主义统治根基的誓死维护。

三、玛丽——殖民权力的迷途

玛丽是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制度的白人受害者。“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玛丽贸然地结婚。”^{[8]27}玛丽与犀牛鞭的结合与她那悲剧式的、“被动的婚姻”是何等的相似。因为生活所迫,玛丽“被动地”挥舞起象征殖民权力的犀牛鞭,却无力驾驭;她生活在非洲大陆广袤的旷原,却对充满生机的青草充满莫名的恐惧。这充分表现出她对殖民权力的不自信。小说中,玛丽既无法克服这种恐惧,又无法与这块土地上孕育的生命和谐相处,在彷徨中选择逃避和背叛而误了卿卿性命,成为“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制度的最大牺牲品和受害者”^{[9]132}。

如果不是丈夫生病,玛丽不得不自己雇佣并监管在田间劳作的黑人,她根本不会接触到犀牛鞭,甚至不会注意到犀牛鞭的存在。“从卧室里出来,她注意到了长长的犀牛鞭,挂在厨房门上的两个钉子上,像件装饰品,她已经很久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了。”^{[6]122}作为白人她是“高贵”的种族,作

^① 同时期法律包括《城市区域法》、《工业调解法》与《禁止通婚法》等,这些殖民地法律带有深深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烙印。

为女性她又是“弱势”的一方,她敢于镇压身体上比她强悍太多的黑人劳工,仅仅是因为她白人的身份以及支撑这种身份背后的权力体系。“在她的背后有着警察、法庭、监狱;而他(摩西)的背后却什么也没有。”^{[6]136} 玛丽试图用犀牛鞭捍卫自己女主人的身份,然而又缺乏驾驭权力的自信与能力。对犀牛鞭的驾驭揭示了她对权力的渴望,又彰显玛丽内心的柔弱。她拿起犀牛鞭期待的是黑人们的服从。“取下犀牛鞭,绕在腰间,玛丽多了几分自信。”^{[6]122} 她信奉皮鞭下挥舞肆虐的权力,不相信感化的顺从。正如玛丽对迪克所说:“我不相信善待他们……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我将用皮鞭让他们服从。”^{[6]131} 最终,她向摩西——这个最终裁决她命运的人——挥舞起了皮鞭。“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静静地站着,全身发抖。当她看着他茫然地把手放到脸上(擦去被鞭打的血印),于是麻木地低下头去看手中的皮鞭,似乎皮鞭是不顾她的意愿自己跑出来的。”^{[6]136} 使用皮鞭惩罚“不顺从”的摩西后,玛丽却终日惴惴不安,充满恐惧。玛丽对摩西心怀恐惧,即便是拥有了给她多了几分自信的犀牛鞭。

然而,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摩西的温情使他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自然。当他们的亲密关系被白人管家托尼无意中知晓后,迫于世俗的压力,玛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背叛和离去。玛丽的彷徨揭示了殖民制度给她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和分裂:情感上,她和这块土地上孕育的生命本可以交融和谐地相处;理智上,她却不得不在殖民主义森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驱使下放弃自己的本性所求。社会的规训是玛丽个性分裂与悲剧命运的根源。

四、摩西——殖民权力的终结

摩西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受到文明教化,比白人表现出更为真挚的绅士和热情。一方面,在辛勤的劳作中他服从于殖民主义者所确立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表现出对“白人文明”的包容。另一方面,他却带有自发的反抗意识,对“白人文明”又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摩西对女主人玛丽亲近而顺从,甚至学习英语,这表现出他并不天然排斥欧洲世界的文明。在遭玛丽鞭打后,他表现出异常的冷静。被玛丽的皮鞭抽打后,摩西只是“茫然地擦去自己脸上的血印”。摩西并没有因为玛丽的抽打而憎恶

她,相反他的包容、对玛丽的体贴和照顾使他成为玛丽最亲密的人,甚至成为她精神上的依托。从摩西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白人文明与当地生活交融的契机,不过这种契机很快就被种族隔离制度下不同种族间森严的割裂扼杀了。当玛丽选择了背叛,摩西也最终认识到自己无法获得白人真正的认同,他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玛丽的生命,也宣告了对白人代表的文明憧憬的破灭。摩西和玛丽都是以白人文化中心论的“白人文明”以及殖民权力统治的牺牲品。正如东方主义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与他们‘异类’之间的系统交往已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我们’和‘他者’。”^{[10]178}

摩西身上具有的细腻热情、勃勃生机令读者震撼。摩西所代表的黑人原住民才是非洲大陆广袤荒原的真正主人。他们的生活、繁衍、呼吸都和这块大地交织在一起,他们世代努力构造的和谐画面,几乎被“白人文明”摧毁殆尽。摩西是皮鞭所象征殖民权力统治和剥削的对象,是被殖民者,由于地理和经济文化上的闭塞,当时的“摩西们”还不具备清晰的民权意识,这注定在非洲大陆结束殖民主义和种族制度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① 小说中摩西终结了玛丽的性命,但并没有真正成为非洲大陆殖民主义和种族制度的终结者。然而,摩西却是终结殖民主义的希望所在,正如其名字——“摩西”所寓意的那样。大概莱辛自己在创作作品时已经预见到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的终结一定会来源于非洲大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省、民族自治的反殖民斗争。主权在民的民权意识下所催生的民族自治注定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因此,从莱辛的作品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哪怕来自摩西身上对殖民压迫一种自发的反抗,也足以让手握犀牛鞭的殖民权力的驾驭者战栗。这是一场殖民统治者的潜意识中早已被感知的、早晚要到来的疾风骤雨,足以摧毁整个旧制度的力量。正如阿杜·博亨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和其他依靠武力建

^① 《野草在唱歌》发表的几十年后南罗德西亚才获得解放,独立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后改称津巴布韦;而南非共和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则经历更长的岁月:南非共和国于1991年废止了《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

立并维持的体制一样,同样是短命的。从1935年起仅仅45年时间,殖民主义已在90%以上的土地上被推翻,只剩下林波河以南的一块地方。”^{[11] 634}毕竟,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殖民统治者对于被殖民者觉醒的恐惧就像一场瘟疫,很快会在白人殖民者中传播,殖民主义下的种族制度也在非洲大陆真正的主人为自己的公民权利不断的抗争中走向死亡。

五、结语

犀牛鞭作为作品中象征手法的特殊运用,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莱辛写作的深意,来审视殖民主义这一整个欧洲文明的污点。纵观人类的历史进程,人类对权力的追求从未停止,在嗜权如血的社会一些物质被用来象征各种权利,这些物质种类繁多,包括了建筑、语言、衣饰、坐骑、餐具,甚至死后的墓穴,不一而足。不同的物质象征不同层次的特权,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如今,被象征的权力早已烟消云散,然而,这些象征物犹在,似乎对逝去的权力以及嗜权者与弄权者发出阵阵的哀叹,更似无尽的嘲讽。对后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不忘前事的无声警示。

Civilization lost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lonial power in *The Grass Is Singing*

CHEN Shang-k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 Is Singing* by Lessing provides an enormous and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South Africa. Meanwhile, with the special use of symbolism Lessing profoundly interpret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lonial power and civil rights. This essa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 in colonial period, gives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colonial power. The lost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frica i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colonists' insatiable desire of wealth. While the colonialism and racism system in Africa had entitled colonists with supreme power they deprive African people of their civil rights, thus bringing great misery to Africa and people who live there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

Key words: civilization lost; colonialism; colonial power; civil right

参考文献:

- [1] HANLEY L.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Doris Lessing in the century of depression [C] // RICHETTI J.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2] SAGAN S 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J]. The New Statesman, 1953(5).
- [3] SPRAGU C. Rereading Doris Lessing: narrative patterns of doubling and repetition [M].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 [4] 蒋承勇. 英国小说发展史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 [5] 杜瑞清. 20世纪英国小说选读: 增订版 [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 [6] LESSING D. The grass is singing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1.
- [7] 吴秉真, 高晋元. 非洲民族独立简史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 [8] FAHIM S S. Doris Lessing: 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9] 夏琼. 扭曲的人性, 殖民的悲歌——评多莉丝·莱辛的《野草在唱歌》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1(1).
- [10] 爱德华·W. 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 [M]. 谢少波,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1] A. 阿杜·博亨. 非洲通史: 第八卷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办公室, 1991.

(责任编辑: 范艳芹)